

中国经济增长究竟有多快？

蔡昉 王美艳

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多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度平均增长率约为 9.5%。增长的速度如此之快，而且持续的时间如此之长，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尽管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诸如失业下岗增多和收入差距扩大等一系列问题，但其增长的高速、健康、稳定性质毋庸置疑。但是，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如此高的增长速度，的确是世所罕见。很多人尤其是国际上的专家学者，对此形成了怀疑的态度，并且发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潮。因此，有必要认真探讨这个问题，以正视听。

一、中国经济增长成绩

1978-200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 9.5%。一些年份的增长率极高，在 15% 上下，增长率最低的年份为 1990 年，略低于 5%。沿海省份实现了超过 10% 的增长速度。物价指数的年增长率大多数在 10% 以下，只有个别年份物价指数的增长率在 15% 以上。1997 年以来，物价指数的增长率一直为负值。总体来说，中国在改革开放的 20 余年中，在没有恶性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是大多数其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未能做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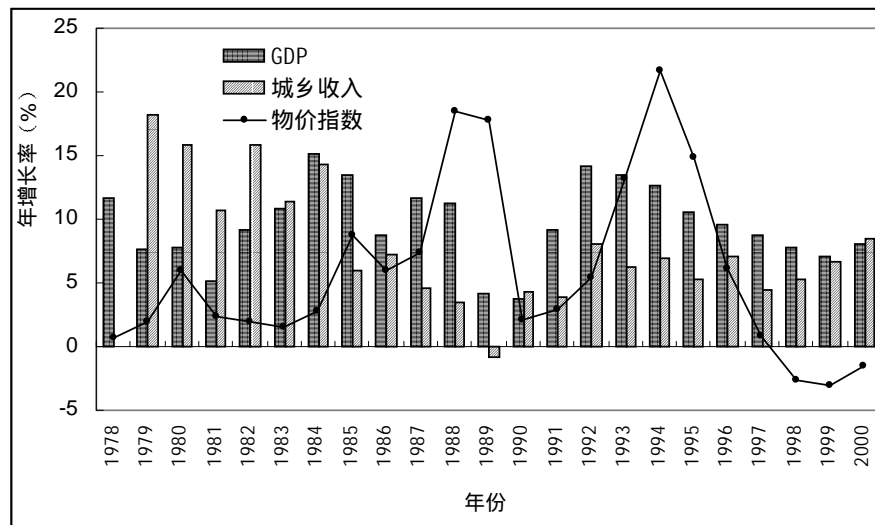


图 1 GDP、人均收入和物价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1》。

经济增长不仅仅是数量的增长，还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1978-2000 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年增长率分别为 4.7%，11.4% 和 10.3%。从图 2 可以看出，三次产业的增长率都较快，但相比起来，第一产业的增长率最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增长率较高，都超过了 10%。正是由于斯密-配第-克拉克法则或农业份额相对下降规律的作用，使得不同产业的增长速度不尽相同，即农业增长相对慢，第二产业增长快，而第三产业有越来越增强的趋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的产值份额及就业份额下降，是一个古老的经济规律。几乎所有

的社会在从不发达到发达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相应于这个趋势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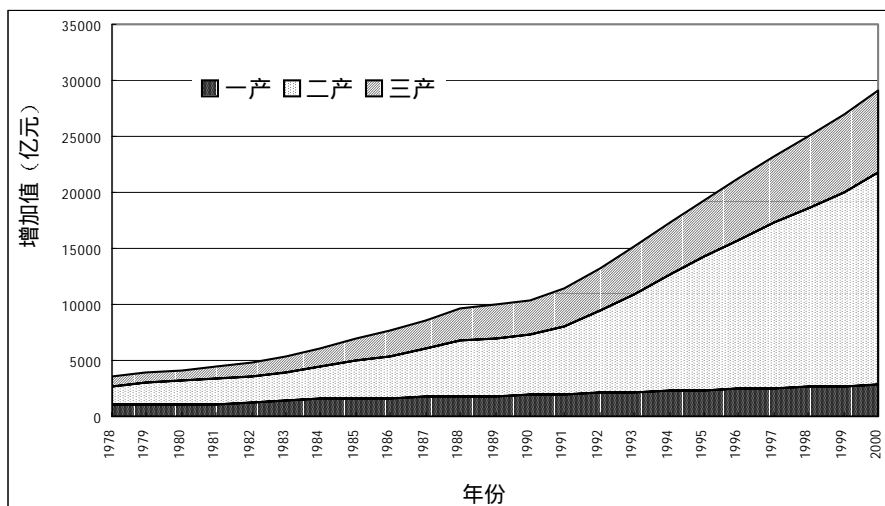


图2 三次产业的增长与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

从人均收入翻番的国际比较看，中国的人均收入翻番所用的时间比其他国家少得多。我们来比较一下不同国家在相类似的增长时期中，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英国在 1780-1838 年期间花了 58 年，美国在 1839-1886 年期间花了 47 年，日本在 1885-1919 年期间花了 34 年，韩国在 1966-1977 年期间只花了 11 年，而中国在 1978-1987 年期间只用了 9 年，紧接着又在 1987-1996 年期间的 9 年中再次翻番。中国的人均收入翻番所用的时间之少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面对中国如此强劲的发展速度，很多机构和部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他们的预测结果一致表明，本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例如，据兰德公司预测，到 201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 8 亿美元，超过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外交与外贸部估计，到 2015 年前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麦迪逊（Madisson）所作的估计与此相近。世界银行估计，如果中国保持当前的发展速度，2020 年，如果美国的 GDP 是 109 个单位，日本是 43 个单位的话，中国的 GDP 将达到 140 个单位。使用汇率法估计，如果中美日的增长率分别保持 1980-1995 年期间的平均水平，即 9.6%，4.0% 和 2.7%，中国经济总规模将会在 2035 年前后超过美日。在这些估计中，中国国家统计局官员的预测结果是最保守的，即按照汇率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于 2005 年超过法国，2006 年超过英国，2012 年超过德国，中叶可能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二、对中国增长速度的怀疑观点

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罗斯基（Thomas G. Rawski）教授，长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在英文刊物《中国经济评论》2001 年 12 月号上发表了专门讨论中国近年来 GDP 统计数据可靠性问题的文章。文章使用各种论据来说明中国官方的 GDP 统计数据不准确。

罗斯基教授首先从各种指标数据增长的不一致来论证 GDP 统计数据存在的问题。他认为，中国 GDP 的增长速度与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很不相配。在能源效率没有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中国的 GDP 在 1997-2000 年间增长了 24.7%，而能源消费下降了 12.8%。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罗斯基也将中国经济与东亚国家经济作了比较，从国际比较中说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

可能如此之快。在东亚国家和十年前的中国，经济增长都伴随着能源使用的增加、就业的增加和消费价格的提高。但关于中国最近经济增长的数据却与此趋势冲突。另外，他还比较了中国全国的总零售额与家庭户预算中的人均消费，发现前者的增长比后者要快得多。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零售额比家庭户收入增长得更加迅速，这表明了平均消费倾向的增长。然而一项研究显示，1998年，城市和农村家庭户的平均消费倾向都有下降的趋势。

罗斯基在文章中还列举了来自中国的一些关于统计数据的评论。文中指出，1998年，中国的分析家开始抱怨统计系统出现“假报和浮夸风”。中国的很多评论都怀疑，在商业阶层和各级政府中，故意地假报经济指标是很普遍的。其结果就是普遍地统计歪曲，出现统计泡沫，为决策层提供错误的信息。朱总理在2000年3月曾经抱怨“假报和浮夸风”猖獗。1998年，国家统计局开始否决各省关于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认为这些数据是加工过的。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为创立绕过地方和省政府的统计网络作出了努力，但统计局至今仍然缺乏收集正常信息渠道之外的数据的能力，尤其是调查研究，还要受更低一级官员的支配。

针对中国官方的GDP增长数据，罗斯基教授作出了另一种估计。中国民航为重估最近的GDP增长提供了参考。乘飞机的人大多是高收入。随着消费者收入的增加和票价的下降，旅游者的交通消费增长应该快于可支配收入和总消费的增长。然而数据表明，旅游者的国内航线里程只增长了2.2%，总里程只增长了3.4%。因此，1997-1998年的实际GDP增长的上限为2.2%，实际值可能远低于此，甚至可能是负的。罗斯基认为，这些数据并不是基于严格的经验数据得出的，但这些数据看起来与中国官方关于就业、价格和能源消费的数据是一致的，而中国官方关于增长率的数据与此并不一致。

此外，由于多数人认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很高，因此很自然，近年来世界经济普遍遭遇到的困难，以及出口形势的恶化，都会制约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因而目前国家统计局报告的GDP增长率数字被认为是不可靠的。

三、对怀疑论的解析

我们并不否认，在这些研究的论据中，也存在一些合理之处。但是，用一些变量（如交通客运量、全社会货物周转量、就业增长、能源消耗等）的数据去推测另一些变量（如GDP增长），却是有条件的，是值得更加深入探讨的问题。忽略经济变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或者把某些时期的经验关系应用到变化了的条件下，其结论有着很大的风险。本文将着重于解释这些关系可能的变化，从而对怀疑论提出怀疑。

由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部门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增长方式或模式也必然发生变化。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已经发生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已呈现出产业结构调整明显迹象，即传统的经济增长主体部分即工农业的产值比重逐渐下降，贡献率缩小，相应地，第三产业贡献率稳步增长。这就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能源消耗的特征也会发生变化。众所周知，第三产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能源消耗是很低的。中国的改革一直在进行，在改革的过程中，劳动力、土地和能源的使用效率都会提高。因此，用以往的增长模式套用在解释当前的经济增长特征，或多或少已经不合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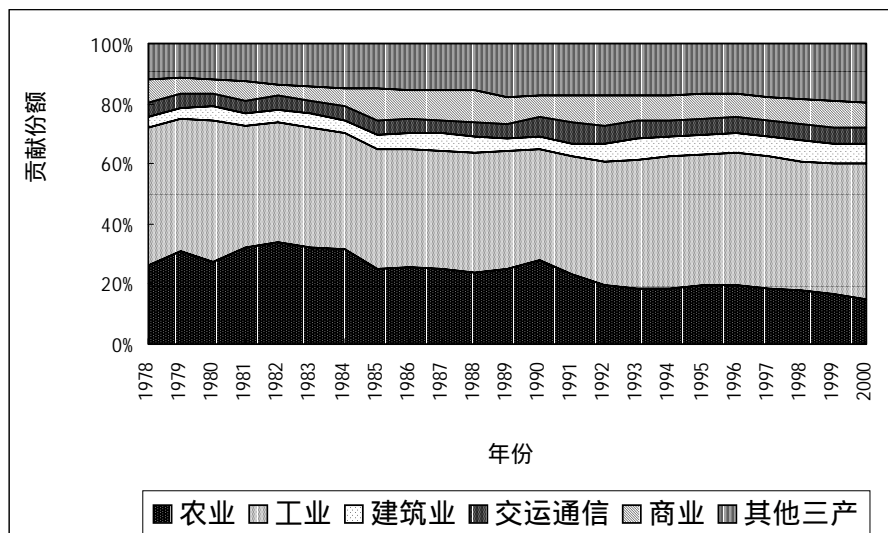


图3 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已经发生变化

注：贡献份额的计算是用每种成分工业产值的年度相对增长率（该成分增长率比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乘以该成分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我们可以计算各种经济成分的工业增长对全国工业总产值的贡献。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1》数据计算。

另外，从各种经济成分对 GDP 的贡献看（图 4），改革之初，国有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超过 80%。目前，国有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贡献已经非常小，城乡个体和其他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近 2/3。我们知道，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规模较大，受政府的限制较多，它们大多被要求生产能源消耗多的产品。而城乡个体、外国独资、中外合资等新型的经济成分从事的大多是消费品的生产，而且大多为劳动密集型，能源消耗低。因此，这种新型的经济成分构成必然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式，包括能源消耗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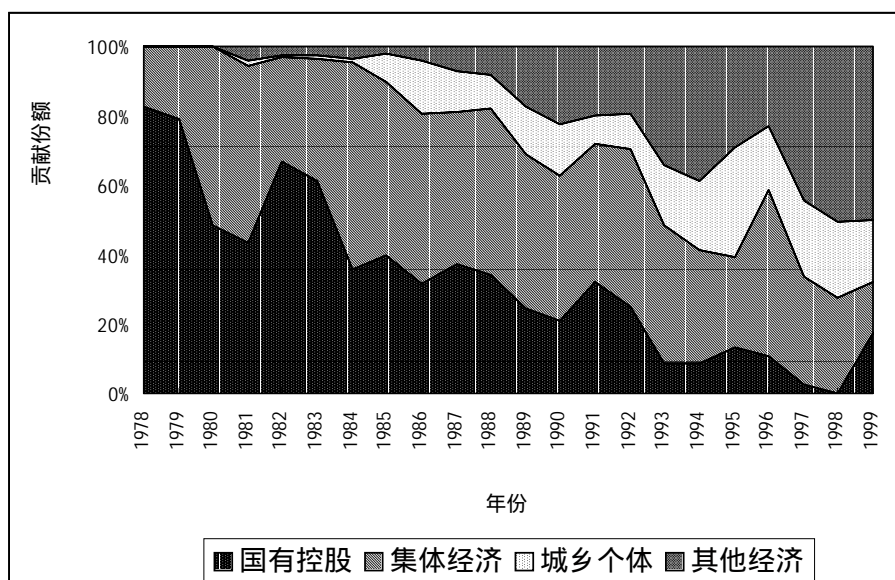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所有制工业的增长贡献

注：贡献份额的计算方法与上述相同。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1》数据计算。

我们用旅客周转量作为交通客运规模的指标（图 5），可以发现，交通客运的增长十分迅速。1978-2000 年，全社会旅客周转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9.3%，铁路、公路、水运和民航的旅客周转量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6.7%，12.3%，0%和 17.5%。除水运因为河流航运能力稳定，旅客周转量没有增长外，铁路、公路和民航的客运增长率都很高，尤其是民航客运，增长率达到 17.5%。如果设定在经济增长与交通客运之间有一个正相关关系的话，由此我们看不到任何经济衰退的迹象。说到民航客运量，其增长率是最高的，但由于民航的客户大多为高收入者，所以民航的旅客周转量所占比重还不高。而中国公路运输的发展异常快速，也更加符合中国居民目前的收入水平，因此，公路的旅客周转量在总旅客周转量中所占的份额是最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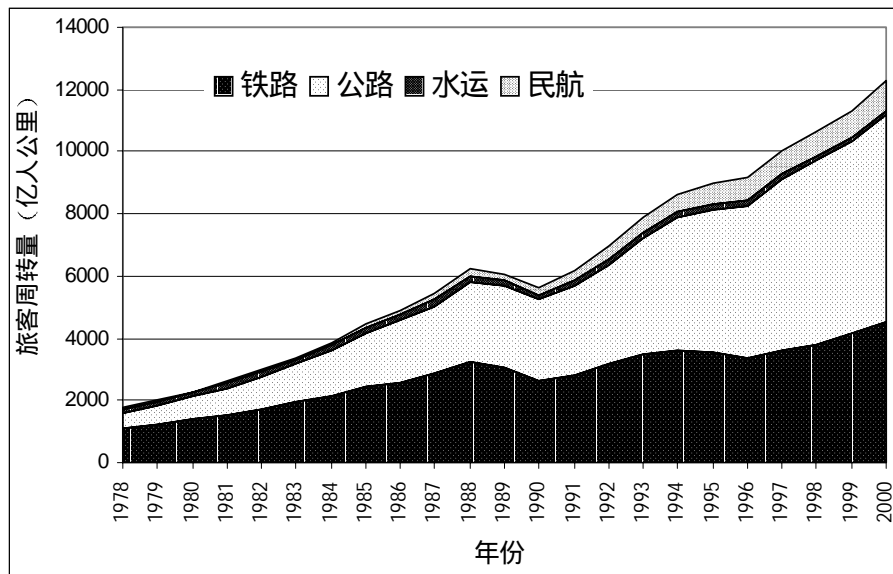


图 5 交通客运量增长与结构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中国交通年鉴 2001》，中国交通出版社，2001 年。

针对罗斯基的估计方法，我们进一步观察民航客运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两者为正相关关系。即国内生产总值越高，民航的客运规模也就越大。第二，民航客运增长率的波动比国内生产总值的波动大得多，即民航客运增长率对 GDP 的增长率具有较大的弹性。在图 6 中，我们刻画了 GDP 和民航客运量两个增长率的年度变化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到这个特点。因此，当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时，民航增长率以更加剧烈的方式下降，是符合中国民航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一贯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用民航增长率来表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显然不合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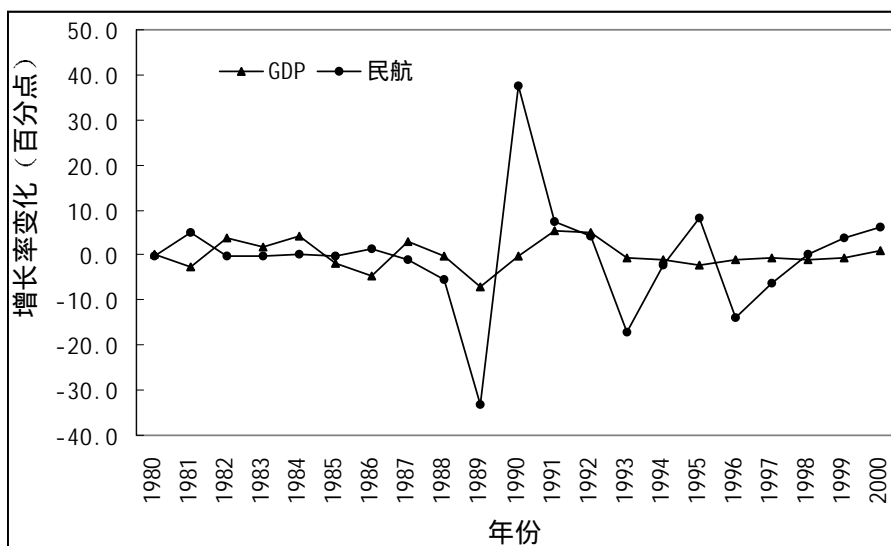


图6 民航与GDP的增长率变化关系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中国交通年鉴 2001》，中国交通出版社，2001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1》。

就业增长的确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两者之间应该具有紧密的联系。同时，城镇正规就业的确具有下降的趋势。然而，中国城乡就业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城镇就业已经不再能够单独解释整个经济的就业状况。其次，城乡就业的结构越来越多元化，而所谓的正规就业并不能作为整体就业的代表。从就业增长的所有制结构消长看，1978-1997年，城镇国有和城镇集体经济的从业人员在从业人员总数中的比重在稳定中略有增长，1997年以后，这一比重急剧下降。而城镇其他和农村非农经济的从业人员比重自1978年以来一直在迅速增长，目前已占从业人员总数的2/3以上。这种就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为保持中国从业人员总数不断增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了观察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我们可以从城镇的单位内就业与单位外就业之间的消长变化看。由于关于劳动就业的统计口径不规范，调整过于频繁，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和外商投资单位作为单位就业，与统计中的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相对应；而把个体、私营企业以及其他不明项目作为单位外就业，在统计中表现为城镇从业人员总数与单位从业人员数之间的差额。总体来看，单位的城镇从业人员数自1978年以来在逐渐下降，而单位外的从业人员数在增长。为了观察近年来两类就业变化趋势，我们对2001年数据进行了一点调整¹，以便与1996年以来的数据一致。到2001年，非正规就业与单位就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几乎平分秋色。城镇的非正规就业大幅度增长，农村的非农产业就业越来越重要，所以，总体的就业趋势还是增长的。城镇正规就业越来越不代表与中国经济增长一道发生的就业增长。更高的增长率应该伴随着更高的就业。中国的就业总体趋势的确是增长的，只是城镇正规就业在减少。

¹我们用2000年城镇从业人员数加2001年的增加数（789万）作为2001年的城镇从业人员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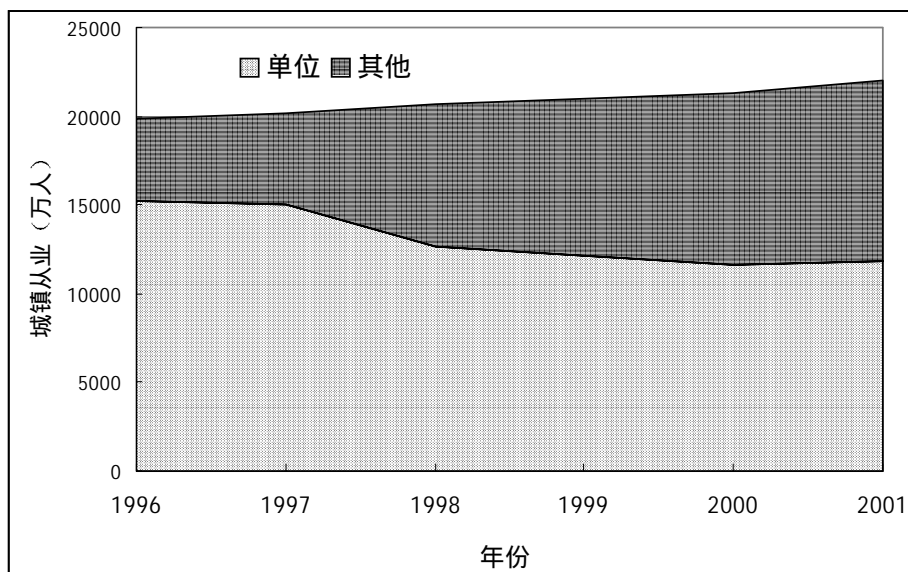


图7 非正规就业越来越重要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1》；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01 年第四季度新闻发布会。

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巨大的地区差距。研究表明，以 1978 年为基期，用变异系数的对数（ σ 指数）、泰尔指数（Theil Entropy）及基尼系数表示的省际人均收入差距指标曾经大幅度下降，直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后开始上升至今，呈现出一个“V”字型的变化轨迹。而对总体地区差距起决定性影响作用的是三类地区之间的差异（林毅夫等，1998；蔡昉等，2000）。然而，地区差距的存在并不能否定中国经济增长的成绩。事实上，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重心在东南沿海地区，这部分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完全可以抵消掉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影响。在 1998-2000 年平均的 GDP 年增长率中，东部地区的贡献率为 58.7%，中部地区为 25.9%，西部地区 17.3%。另一方面，按照国际标准，中西部地区的增长也是相当高的。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并不像人们感觉的那么大。在按汇率法计算的世界 10 个最大经济中，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外贸依存度）并不是最高的。而在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 10 个最大经济中，中国进出口总额占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国则处于最低水平之列，仅高于印度（见图 8）。可见，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仍然是国内需求。国际贸易状况的变化波动会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因为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很低，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不应该太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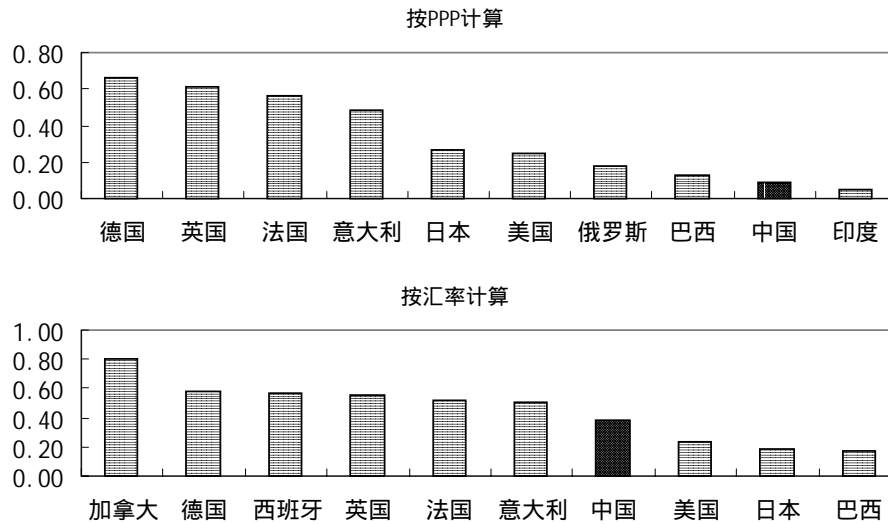


图 8 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并不高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年。

四、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依旧

在一个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除了常规的生产要素投入（资本和劳动）的增加导致经济总量（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外，往往还有一部分增长不能由这种要素增加来解释。也就是说，除了资本和劳动对产出增加作出贡献外，还有一些未被发现的因素在起作用。稍早的时期，人们把这个未知的因素叫做该生产函数的“残差” (residual)。后来，经济学家逐渐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认为这个未知的因素，实际上是一系列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综合表现，所以将其叫做“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这种通过生产函数对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进行分解的方法被经济学家们称为“增长帐户” (Growth Account) 法。

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践进行了更深入的分解分析（参见蔡昉等，1999）。通过估算我们观察到，首先是两种常规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对于 1978~1998 年期间年平均 9.5% 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作出贡献，其中“物质资本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作出了 28% 的贡献，“劳动力数量增长”则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作出了 24% 的贡献；其次还将“人力资本”因素从“劳动力数量”或“物质资本”中单独分离出来，其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作出的贡献与“劳动力数量”贡献相同，为 24%；进一步通过特殊的方法估计出“劳动力部门转移”，即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农业）向生产率高的部门（非农产业）流动过程对增长的贡献，贡献率为 21%；最后余下的所谓“未解释部分”，可以看作是其他体制改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3%。

可以看出，物质资本积累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而中国物质资本积累的潜力不会耗竭。从固定资产投资看（图 9），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有多种来源。80 年代以来，国家预算的固定资产投资数额一直很小，而且几乎没有增长；国内贷款和自筹其他的固定资产投资数额都在迅速增长，而且这两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绝大部分；利用外资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在增长，但幅度不是很大，而且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很低。西方人认为，中国的繁荣是靠 470 亿美元的外资支撑的。但从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看，外资的重要程度并不是那么高。中国多样化的物质资本积累来源可以保障资本的供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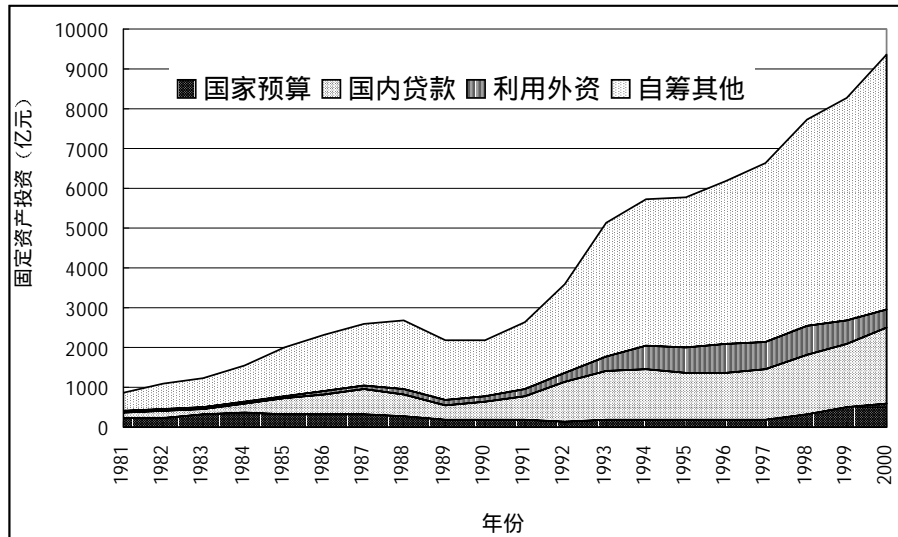


图9 物质资本积累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1》。

劳动力数量是否会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呢？从人口数量和结构预测看，2010年以前，劳动年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会持续提高，2020年以前，这个比例将保持很高。2020年以后，这一比例会下降，但降幅很小，本世纪内，会基本保持在55%上下。因此，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会在长期内保持一个很大的绝对数量。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尽管一直在上升，但到本世纪末也刚刚超过20%，因此，老龄人口的负担也不是承受不起的。可见，今后20年中国仍然可以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挥比较优势。

人力资本增加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与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率相同，也为24%。顾名思义，人力资本就是对人进行投资而形成的资本存量，它体现了知识和技能，而正是这种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经济增长。广义地看，人力资本包括多种形式的投资结果，最基本的如对卫生和营养的投资可以改善人的健康状况；对个人进行培训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技能；接受正规教育可以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并有助于学习能力的增强；而对研究和开发的投资则可以通过外部的效果来提高个人的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引擎。改革以来，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很快，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逐年递增，而且在东中西三类地区都迅速增加，保证了经济增长的后续力。

劳动力转移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中国的农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对称。虽然农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一直都在降低，但农业产值比重一直大大低于就业比重，这意味着过多的农业劳动力生产较少的国内生产总值，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可以大幅度提高配置效率。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劳动力转移会一直持续下去。因此，劳动力转移将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提供持续的源泉。目前，中国仍然有1.5-2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一项重大进展是2001年开始的户籍制度改革。大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转移出来，预期城市化水平将有一个迅速的提高。

在分解出劳动力转移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之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意味着仍然有巨大的提高潜力。经济活动中技术效率的提高，依靠两个动力。第一是非国有经济的扩大。以往的经验研究证明，非国有经济比国有经济的生产率高得多（姚

洋，2000)。所以，非国有经济比重的扩大就会提高经济整体的生产率。第二是在非国有经济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竞争加强的压力下，国有企业为加强自身的竞争能力，本身也在改革，从而提高生产率。

五、总结

本文并不试图系统回应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 GDP 统计的怀疑与批评，也无意掩饰中国统计中存在的问题，而仅仅尝试通过对中国经济的长期观察，表达以下几点看法：（1）中国经济自改革以来至今的持续、快速增长业绩是不容怀疑的；（2）许多用来证明中国经济增长数字不真实的方法，可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3）过去 20 余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不会耗竭，仍将支撑今后的高速增长。此外，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统计应该进一步提高其科学性、透明性，以避免出现不必要的误解。

参考文献:

蔡昉、都阳(2000)《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差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经济研究》第 10 期。

蔡昉、王德文、都阳（2001）《中国经济增长“条件趋同”中的制度因素——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区域差距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第 2 期。

姚洋（2000）《非国有经济成分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载林毅夫、海闻、平新乔编《中国经济研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内部讨论稿选编 1995-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8）《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经济研究》第 6 期。

蔡昉、王德文（1999）《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第 10 期。

中国的 GDP 统计是怎么回事？

托马斯·罗斯基

2001 年 5 月在与北京的一些经济学家交谈时，我表达了对中国 GDP 统计反映真实经济绩效的怀疑。据《纽约时报》，“中国 GDP 的实际增长率充其量只是其所报告的一半”。我认为，从 1998 年开始，标准的 GDP 数据被夸大，其程度远远超过最近研究中所提到的技术困难。本文着眼于三个问题：各种指标的不一致、中国学者自己的评论，以及统计高估的可能程度。

一、数量上的不一致

表 1 中国 GDP 增长与相关数据：官方数据和替代估计（百分比变化）

	1998	1999	2000	2001	累计增长 1998-2001
实际 GDP					
官方统计	7.8	7.1	8.0	7.9	34.5
替代估计	-	-2.5/+2.0	2.0/3.0	3.0/4.0	0.4/11.4*
	2.0/+2.0				
	0				
能源使用	-6.4	-7.8	1.1	1.1	-5.5
城市正规就业	2.3	1.6	1.2	1.2	0.8
消费价格指数	-0.8	-1.4	0.4	-0.5	-2.3

注：替代数据是作者的猜测。

GDP 在 1997-2000 年间增长了 24.7%，而能源消耗下降了 12.8%。在这三年中，虽然计算机制造和其他低能源消费的活动在迅速增加，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下降 30% 也是不可能的。能源效率的迅速增长并不是中国经济常轨。例如，1997-1998 年，生产热电、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的能源转换效率都下降了，而总的能源转换效率几乎与 1983-1984 年相等。

国际数据的比较也说明中国最近的增长速度难以置信。表 2 概括了 50 年代以来，几个东亚经济在类似的较短发展时期的情况。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十年前的中国，经济增长都伴随着能源使用的增加，更多的就业和消费者价格的提高。但表 2 关于中国最近经济增长的数据显示，产出增长和能源下降两种趋势是相互抵触的。

表 2 东亚经济增长的情形（累计百分比变化）

累计变化	日本 1957-61	台湾省 1967-71	韩国 1977-81	中国大陆 1987-91	中国大陆 1997-2001
实际 GDP					
官方统计	52.8	49.7	21.6	31.8	34.5
替代估计					0.4/11.4

能源消费	40.1	85.2	33.6	19.8	-5.5
就 业	4.6	17.0	9.4	23.2	0.8
消费价格	10.6	20.6	111.7	46.6	-2.3

在 1997-1998 年期间，有一系列现象令人难以置信：在经历了 20 世纪最严重的十次自然灾害之一的洪灾之后，除了一个省之外，其他省份的农业产出都增长了；在 94 种主要产品中，只有 14 种产品是两位数的增长，而 53 种产品的实物产出下降，工业生产仍然增长了 10.75%；钢铁消费和水泥产出增长了不到 5%，投资支出却增长了 13.9%。消费被认为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拉动力，但关于消费的数据也很成问题。

表 3 将中国零售增长的全国数据与城乡住户的人均支出变化调查数据进行了比较。除了一个例外，全国的零售数据比家庭户预算中的人均消费数据的增长要快得多。这个差异太大，以致于不能归结于人口增长，因为人口的年增长率仅约 1%。

表 3 零售额、人均收入和花费的增长（百分比，名义数量）

					累计增长
	1998	1999	2000	2001	1997-2001 *
总零售额	6.8	6.8	9.7	10.3	38.0
城市数据					
零售额	7.1	7.1	10.6	11.6	41.6
人均收入 *	5.2	7.9	7.3	6.7	30.0
生活花费 *	3.4	6.5	8.2	4.6	24.6
农村数据					
县零售额	5.2	5.7	8.3	9.3	31.6
县以下零售额	7.0	6.6	8.3	7.4	32.7
人均纯收入 *	3.4	2.2	1.9	-7.5	-0.4
人均现金支出 *					
系列 A	0.8	-0.9	-8.5	-6.8	-14.8
系列 B	-1.5	-1.5	-0.7	-6.8	-10.2
人均消费现金支出 *					
系列 A	0.2	1.4	12.2	6.6	21.5
系列 B	-1.7	-0.8	5.9	6.6	10.1

* 数据来自家庭户调查。

更加成问题的是，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零售额比住户收入增长更加迅速，这表明平均消费倾向的增长，即住户收入中的消费支出比例的增长。然而一项研究显示，1998 年城市和农村住户的平均消费倾向都有下降的趋势。另有报告指出，有限度的收入增长增强了人们储蓄的倾向，消费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持续下降。这恰好与零售数据所揭示的相反。

二、中国经济学家的看法

从 1998 年起，中国的分析家开始抱怨统计系统出现“假报浮夸风”。中国的很多评论都怀疑，在经济活动和各级政府中，故意地假报经济指标是很普遍的。其结果就是统计普遍被歪曲，出现统计泡沫，为决策层提供错误的信息。朱总理在 2000 年 3 月曾经抱怨假报和浮夸风猖獗。1998 年，国家统计局开始否决省里关于经济增长的数据，认为是加工过的。尽管为创立绕过地方和省政府的统计网络作出了努力，统计局还是缺乏收集常规渠道之外数据的能力，特别是由于调查易于受到较低一级官员的干扰。

中国的政策讨论常常不用官方的信息。2001 年 7 月的一份报告援引了吴敬琏的观点，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扭转了始于 1997 年的向下走势。”2001 年 8 月的一个关于财政政策观点综述指出，1998 年的赤字支出是为了克服内需不足和出口缩减而实施的。既然经济已经复苏，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削弱。但官方的预测表明，1999-2001 年正在复苏的经济仍然慢于 1997 年，也不比处于危机中的 1998 年强。这说明，中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进行分析，是基于个人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表 1 中官方报告大相径庭。此外，中国很多报告直接与官方数字不符。

三、最近 GDP 增长的另一种估计

自从摈弃了省的增长报告，国家统计局对其怎样得出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官方估计数字，并没有作出公开的解释。地方和省统计局、中国的经济分析家，甚至国际上的银行家和寻求与中国政府机构建立商业关系的企业的市场研究人员，都被笼罩在确保官方增长目标的压力之下。我们无法相信，国家统计局会不受这种环境的影响。对于任何与作者同样不满意官方数据的读者，分析最近增长趋势，必然要从揭示一个不同于表 1 官方数字的替代数字做起。

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多样性给任何这样的努力带来了可怕的障碍。不过，中国民航业却为重新估计近年来 GDP 的增长提供了一个起点。乘飞机旅行吸引的是高收入的消费者。既然 90 年代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平等的加剧，民航旅客的收入增长一定会高于常规，而且可能超过的幅度很大。1998 年一场激烈的价格战使得票价猛降。航空公司通常给国内航班的旅客打 30-40% 的折扣。随着消费者收入的增加和票价的下降，交通消费的增长应该快于可支配收入和总消费的增长。然而 1997 年和 1998 年的数据表明，航空客运的国内航线里程只增长了 2.2%，包括国际航线的总里程增长了 3.4%。如果不存在国内生产总值在结构上的重大转变，经济学关于需求和消费的基本原理表明，在 1997-1998 年期间，实际 GDP 增长的上限不会超过 2.2%。下降的能源使用量、诸多产业部门产出的减少、大规模的下岗，广泛的生产能力过剩、存货堆积以及重大水灾的影响等，使得这一数字比官方 7.8% 的数字更加靠得住。估计的 2.2% 只是上限，实际值可能远低于此，甚至可能是负的。在中国的各种报告中所描述的定量图景是，1998-1999 年中国的 GDP 增长略微下降，随后提高。持续的超额供给、价格下降的压力、接近于零的就业创造、广泛的生产能力过剩、存货堆积，以及闲置的银行存款的大规模累积都表明，实际的增长在足以吸收新的城市劳动力的 7% 以下。这一切都更加强了表 1 中替代估计的可信程度。

这些考虑都支持表 1 中列出的关于中国最近 GDP 绩效的替代估计。这些数据并不是基于严格的经验数据得出的。但这一系列替代估计似乎与中国的政策讨论以及官方关于就业、价格和能源消费的数据是一致的，而官方关于增长率的数据与此并不一致。官方近年来的绩效指标则隐含着这样的意思，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空前的时代，高速增长伴随着下降的能源消费、下降的价格、最低的就业增长、广泛的生产能力过剩、低预期和大笔用来刺激经济景气的开支。尽管最近的增长与经济逻辑不相符，并且与诸多中国权威信息相冲突，但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仍然习以为常地使用着官方数据。正是这种“一如既往”的做法，导致蹩脚政策的产生，以及研究成果缺陷百出。另一种做法是假设国家统计局面临着与地方政府相同的政治压力，即“GDP 增长率是衡量干部政绩的首要标准”，把近年的 GDP 增长率 7-8% 的数字看作是官方目标的反映，而不是实际的经济结果，以便继续寻找能够提供真实评价中国最近经济绩效的替代数据。

（王美艳译）